

南宋(1127—1279年)刻书地域考

张 秀 民

宋代是我国雕板印刷术的黄金时代。宋朝的統治阶级为了巩固封建秩序,宣傳封建文化道德,大力提倡刻书。国子监等处出版的經书課本与医书,除頒发各地外,并許可印卖。宋代官吏的待遇特别优厚,除正式俸錢祿米外,有“公用錢”等各种巧立名目的补助費,又可动用地方公款,这对于地方官的刻书具备了良好的經濟条件。南宋四大詩人尤袤、楊万里、范成大、陆游与理学家朱熹、張栻,在各地做官,都刻过书。洪迈刊行“万首唐人絕句”,受到皇帝茶、香、金器的厚奖,因此更鼓励大家刻书。公余之暇,地方官会同屬吏“以校讐刻书为美績”。宋王明清說:“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陆放翁說:“近世士大夫所至喜刻书板”。刻书成为一时風气,又是做官的一笔外快收入。唐仲友任台州知州时,利用官錢开雕“小字賦集”、“荀、揚、韓、王四子”、除送人二百余部外,把四百部发归婺州本家书坊发卖。当时像唐仲友这样假公济私的人,当然不在少数。“至于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刻工、印工、以刊印书籍为生者以万計。各处营业书坊也普遍設立。印本书籍不但为国内的重要商品之一,并且受到金国、西夏与外国的欢迎,使中国的学术文化傳布到亚洲各国。

北宋时,开封京城、浙江、福建、四川、湖南、山西、广东等处都刻过书;但是由于书籍、印板与其他一切文物珍宝,一古脑儿为金兵所搶走,流傳到现在的北宋印本、除极少量的佛經外,其他书籍已是寥若晨星。我們已无法了解当时各地刻书的情况了。

南渡以后,黄河流域全部丧失,南宋所有的土地,仅限于长江、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孝宗以后,时局稳定,經濟漸趋繁荣,农业、手工业、矿业日漸发达。江南东西路茶叶、冶鑄、金帛、稻米之利,收入甚丰。福建路由于兴修水利,灌溉便利,无凶年之忧,土少人多,虽硯确之地都被用来耕种,地价增貴。川峽四路,地狭而腴,人口最众,民勤耕作,无寸土荒廢,一岁可三四收。两浙路有魚、米、盐、布

之产,又常有外国商船往来互市,亦为主要財賦之区。长沙在南宋初年,連續丰稔三十八年,“斗米二三錢,县县人烟密,村村景物妍。”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文化教育自然普及。如四川“庠塾聚学者众”,“文学之士彬彬辈出”。而福建人好学,喜欢写文章,登科第,出仕中央及地方者尤多。^①福州乡里各有“书社”(学校),学生多的有数百人,少亦数十人,有的虽然四、五十岁,不以老为耻,还去上学。学校課程是一岁通一經,每逢三日、八日、学习做詩賦、經义与論策。当时有人作詩說:“学校未尝虛里巷,”“城里人家半讀書。”^②孝宗乾道元年(一一六五年)秋,福建報名乡試的有一万七千人,有的甚至說十万人。宋末,拿著雨伞,背着书箱,进京考試的,福建人常占全国之半。^③至于京城临安(杭州),自吳越錢氏至北宋約近二百年,未遭兵災。苏东坡知杭州时(元祐五年一〇九〇年),曾估計城內約有四、五十万人。南宋时,因杭州成为首都,人口更加集中,宋末約有三十九万户,有的說“戶口蕃息,近百万余家”,馬可波罗估計当时約有一百六十万家。这虽未免夸大;然而杭州是十三世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是不容怀疑的。因此杭州城內外的学校,自然比福州更多。当时有所謂“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与“乡校”、“家塾”、“舍館”、“书会”,每一里巷就有一二所,絃誦之声,往往相聞。^④可見南宋都市教育的发达。此外,各地較高的学府又有“书院”,如紹兴之“稽山书院”,婺州之“丽澤书院”,全国約有数十所。而以江西之“白鹿”、湖南之“岳麓”等书院为最著名。邛州“鶴山书院”藏书多至十万卷。宋代的书院不但藏书,也刻书,如“丽澤书院”刻司馬光的“切韵指掌图”,“象

① 以上略据“宋史地理志”。长沙“斗米二三錢”見宋本王阮“义丰文集”。

② “淳熙三山志”卷四十。

③ “淳熙三山志”卷七。无名氏“捫蝨新話序”。淳祐辛亥陈必复題林倚仁“端隱吟稿序”。

④ 灌园耐得翁“都城紀胜”。

山书院”刻袁燮的“藜斋家塾书钞”，“龙溪书院”刊“北溪集”，“建安书院”鐫“晦庵朱文公文集”等。

由于教育普及，学生众多，需要大量供应日用的課本、参考书，因此更推动政府与私商的出版事业。同时公私藏书也自然多起来。北宋时，各地州学，已往往建有藏书阁，至南宋更为普遍，如江西十一府，每府都有藏书。四川州郡一向藏书最多。浙东庆元府（宁波）所藏“賜书”，就有三百八十部，三千二百十九册。現在我們还可看到这类官书，如北京图书馆藏的宋本“欧阳先生文粹”，书上盖有朱文大官印数十方，印文云：“安撫提刑汪郎中置到紹兴府学官书，許生員关看，不許带出學門。”这种規定，已很近似現在公共图书馆的善本书閱覽規則。至于私人藏书家人数与藏书量的增多，自然也是意中事。当时“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仅湖州一地，有数万卷的藏书家，就多至七、八家。

現在根据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宋本书，“书林清話”、“两浙古刊本考”与諸家目录等，把南宋各路の刻书地点列表于下：（其地名上有○的是表示刻书較多之地，有△的表示刊刻大藏經的地方。）

南宋刻书地域表

路 名	刻 书 地
两浙东路 (今浙东东部)	○紹兴府(越州)、会稽、嵊县、余姚 ○庆元府(明州)、鄞县、象山、温州、瑞安、永嘉、台州、黄岩、天台 ○婺州(金华)、东阳、义乌、兰溪 ○衢州、开化、处州
两浙西路 (今浙西及苏南)	○临安府(杭州)、钱塘、临安、余杭、盐官、昌化、嘉兴府(秀州)、崇德、华亭 △湖州(安吉州)、武康 ○严州 △平江府(苏州)、长洲、吴江、崑山、鎮江府、丹阳、常州、无锡、宜兴、江阴軍
江南东路 (今南京皖南及赣东一部)	○建康府(南京)、溧水、溧阳、宁国府、宣城、徽州、婺源、池州、太平州、当塗、广德軍、饒州、德兴、鄱阳、安仁、信州、上饶、南康軍

江南西路 (今江西及鄂东一小部)	隆兴府(南昌)、江州、瑞昌、贛州、吉州、撫州、临川、瑞州(筠州)、高安、袁州、萍乡、兴国軍、南安軍、大庾、临江軍、新喻、建昌軍、南丰
淮南东路 (今苏北大部与皖北一小部)	揚州、楚州、山阳、泰州、眞州、滁州、高邮軍、淮安軍
淮南西路 (今皖北及鄂东、豫南一小部)	安庆府(舒州)、庐州、舒城、和州、霍山、无为軍、蕪州、罗田、黄州、光州
荆湖北路 (今湖北及湖南一小部)附襄陽府	江陵府、德安府、安陆、鄂州、崇阳、复州、归州、巴东、澧州、荆門軍、岳州、沅州 襄陽府、鄂州
荆湖南路 (今湖南)	潭州(长沙)、湘阴、衡州、道州、永州、零陵、郴州、桂陽軍、邵阳、全州、武岡軍、茶陵軍
成都府路	○成都府、广都、○眉山、青神、嘉定府、犍为、邛州、阳安、綿州
潼川府路	潼川府(梓州)、遂寧府、資州、銅梁
夔州府路	夔州、忠州、南平軍
利州路 (以上四路均今四川及贵州陕西之一小部)	益昌
福建路 (今福建)	△福州、侯官、怀安、永福、福清 ○建寧府○建安○建阳(嘉禾)、崇安、泉州、晋江、南安、同安、南劍州、漳州、龙溪、汀州、宁化、邵武軍、兴化軍、莆田
广南东路 (今广东)	广州、怀集、肇庆府、連山、潮州、潮阳、博罗、富川
广南西路 (今广西及海南島)	靜江府(桂林)、象州、柳州、琼州

观上表南宋十五路地方，几乎沒有一路不刻书。至于襄陽府旧屬京西南路，当时未被金人占据，

故宋人仍在刻书。南宋刻书地点可考者共一百七十三处,这比同时北方金国有九路二十一处刻书,范围自然要扩大了。南宋刻书以两浙路四十二处为最多,次为江南东西路三十七处,荆湖南北路二十四处,次为福建路二十一处,广南东西路较少。其分布地点,不但有各路的首府,也有偏僻的小县。有的地方刊书数种,以至数十种或近百种。若把各地书坊出版的加在一起,为数更多了。

以上各地,尤以两浙路之临安府,绍兴府、明州、婺州、严州、湖州、平江府,江南东路之建康府,四川之成都府、眉山,福建路之福州与建宁府之建安、建阳,为刻板中心。今略述于下:

宋叶梦得说:“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大家认为这是公允的定评。杭州本自北宋已享盛名,它是从吴越钱氏大刻佛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北宋监本,除汴京国学开雕外,有不少是写好板样,送到杭州、派人监雕的。如淳化本“史记”、“前后汉书”,咸平本“七经正义”,以及“资治通鉴”、“外台秘要方”等都是。杭刻的佛经板片,并由海船运销到朝鲜。南渡以后,临安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公私出版事业更是雨后春笋,得到蓬勃发展。绍兴九年(一一三九年)起,新设立的国子监开始刊雕经史。二十一年(一一五一年)高宗说:“监中其他阙书,也令次第鏤板,即使多化钱亦所不惜”。由是监中缺书复全。同时,以监本药方頒发諸路,刊行“大观证类本草”。后来又刊印“礼部韵略”、“刑统”等不少书。监本是政府頒布的标准本,照理不应有什么错误;但是南宋监本的舛误、仍然不少。当时有许多监本,并非监中自刻,乃是把各地方如临安府、湖州、衢州、台州、泉州、以及四川等地所刻的书板取来,放在监中,也算是监本。国子监书板庫設在中門之内,印书地方称为“印文字所”,或称“印书作”。宋末,这类板片有书名可考的,共計一百多种,经、史、子、集都有。^⑤

除国子监外,德寿殿、修内司、左虞司局、太医局、浙西轉运司和临安府也都刻书。寺庙中如西湖净慈寺,也印行了佛书“嘉泰普灯录。”

京城內私人设立的书铺林立,称为“经铺”,“经坊”或称“经籍铺”、“经书铺”、“书籍铺”,又叫“文字铺”。它们不但印卖佛经,也大量印行儒家的经、史、子、集、俗文、杂书。其中有铺名可考的,有以下十六家:

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或作临安府睦亲坊陈宅经籍铺
临安府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或作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巷口陈解元宅
临安府洪桥子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
临安府鞞鼓桥南河西岸陈宅书籍铺
临安府太庙前尹家书籍铺或作太庙前尹家父子文字铺
临安府众安桥南街东开经书铺贾官人宅或作临安众安桥南贾官人经书铺
临安府修文坊相对王八郎家经铺
钱塘門里車桥南大街郭宅经铺
保佑坊前張官人經史子文籍铺或簡稱中瓦子張家行在棚南街前西經坊王念三郎家
杭州沈二郎經坊
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牋紙馬鋪鍾家
太学前陸家
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經史书籍荣六郎家
錢塘俞宅书塾
錢塘王叔边

其中猫儿桥牋紙馬鋪鍾家,虽然是卖迷信品的,但也印行了“文选”。王念三郎家刊“金剛經”,成为名副其实的“经坊”。至于荣六郎家原住东京大相国寺东,它与一部分酒饭館、絨綫鋪,都是旧京师人,由开封迁到新京,老店重張,繼續營業。绍兴壬申年(一一五二年),荣家将京师旧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这样,由汴京迁来的新书铺,加上杭州原有的书铺,书铺的数量增加,出版品自然也随之增多。其中最有名的书铺,算是临安府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前者为陈起所开设,后者为陈起的儿子陈解元,号续芸所开。陈起字宗之,又字彥才,号芸居,称陈道人,又称武林陈学士。他与江湖诗人詩酒往来,人家买不起书,他可以賒賬。有人贈他的詩句云:“字画堪追晋,詩刊欲遍唐。”他们父子出版了唐宋人集和笔记小說約近一百种。元戴表元说:杭州陈道人家印书,凡有怀疑之处,随便用己意改正,“是书之一厄”。可见他的出版品校勘不精;但是由于杭州刻印工技术高明,紙墨工料又多选上等,所以“书棚本”仍不失为刻印精美的艺术品,为明清以来藏书家所宝爱。

次于杭本者,有“越本”、“婺本”、“明州本”、“衢本”、“严本”等。“越本”或称“越州本”、又分“绍兴府本”及“浙东轉运司本”。前者有“論衡”、“越絕

书”、“嘉泰会稽志”等，地方文献。后者有“五经正义”、“事类赋”、“兰亭考”等。婺州、衢州均有书坊。婺州书坊有婺州市門巷唐宅，婺州义烏青口吳宅桂堂，义烏县蘇溪蔣宅崇知齋，婺州东阳胡宅王宅桂堂，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婺本”經书与“监本”、“建本”、“川本”齐名。衢州亦为“著名雕书籍去处”，所刻有“四书”、“三国志”、“五代史”、“新仪象法要”等。据“宝庆四明志”卷二所载的书板，有“四明尊尧集”、“四明續志”等二十八种，三千多板，称为“明州本”，或“四明本”。据“景定严州續志”卷四所载，郡有經、史、詩、文、方书凡八十种，內“近思录”等四种，注明是“知郡华文錢寺丞任內刊”，所謂錢寺丞，即錢可則。其他为陆放翁、陆子遜父子所刊的，有“世說”、“南史”、“劍南詩”、“劍南續藁”等。此外，湖州与苏州又各刻了“大藏經”。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王永从、王永錫兄弟，既在思溪创建圆觉禪院，建塔十一层，紹兴二年（一一三二年）又捐舍家財，开鋅大藏經板，总五百五十函，永远印造流通。当时印經坊即設在該禪院內。王氏刻藏經有余板，又刊“唐书”及“五代史”，后該两书的书板均被国子监取去，成为“监本”。嘉熙三年（一二三九年），安吉州思溪法宝資福禪寺刊經五千七百四十卷，自“天”字至“最”字，称“思溪藏”。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为楊守敬从日本购归的。安吉州即湖州改名，王国維以为思溪前后两藏，本是一物，唯后者又增添五十一函云。平江府磧砂延圣院（在今江苏吳县），从紹定四年（一二三一年）起，也刊行藏經，多至一千五百三十二种，六千三百六十二卷，直至元至治二年（一三二二年）始毕功。原本今藏陝西省图书馆，称“磧砂藏”，曾有影印本。

四川成都自唐末五代以来，已为出版中心。宋初政府又派人往成都监雕全部大藏經，从开宝四年（九七一年）至太平兴国八年（九八三年）雕成十三万板。这是我国第一次雕成全部大藏經，称“蜀版藏經”或“开宝藏”。北宋初年送给西夏、朝鮮、日本、越南的，就是这部印本藏經。它对亚洲各国初期的印刷事业，发生了很大影响。可惜流傳至今的，国内外只有数卷了。到了南宋，成都与建宁一样，同是私商荟萃之地。印本流傳的有“鶴山大全集”等，以及广都裴宅雕印的“六家文选”。此外，苏东坡老家眉山，也刻了不少书，如眉山刊“七史”、“梅

亭类藁”和眉山程舍人宅刊“东都事略”等。宋蒲叔献說：“吾蜀文籍，巨細毕备”。宋代四川人有文章流傳的，至今还有五百家，多为零星散篇。蜀中所刻，宋人称为“蜀本”或“川本”，质量可与“杭本”比美。

建阳县与建宁府附郭的建安县，不但是福建刻书的中心，也是宋代出版业的中心之一。宋祝穆“方輿胜覽”把印本书籍列为建宁府的“土产”。建阳县西七十里的麻沙、水南、崇化及长平等地，书坊林立。尤其“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宋刘克庄說：建阳“两坊（指麻沙、崇化）坟籍大备，比屋絃誦。”朱子說：“建阳板本书籍，上自六經，下及訓傳，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而供科举夹带的书，又“百倍經史。”^⑤可見其产量之多，行銷之广。直到明正德年間，建宁书坊群籍还是遍天下。福建刻本称为“閩本”、“建本”或“建安本”；建阳麻沙鎮所出的称“麻沙本”。“麻沙本”因为粗制濫造，旨在速售，所以有时鬧笑話。如有人考試出“易經”題目，乾为金，坤又为“金”。学生就哄起来质問道：“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則坤为‘釜’也。”“麻沙本”因为錯誤較多，被当时人看不起，几乎成了劣本或恶本的代名詞。它不但校对馬虎，連内容也任意删节，一卷书有的只有一頁或数行。又用柔木刻板，字划容易模糊损坏，多用本县出产的竹紙——“建阳扣”（土人称为“书紙”）来印，紙质脆薄，顏色黃黑。因为内容与材料形式都不好，所以給人一种不良印象。但是因为“福建本”几偏天下，品种繁多，成本低廉，适合广大人民的购买力，滿足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需要。因此，流傳到現在的宋板书以“建本”为較多，自然其中也不乏刻印精美与有学术价值的作品。

现在把建安、建阳两县的书坊，有姓名可考的，汇記于下：

建宁府黄三八郎书鋪

建宁书鋪蔡琪純父一經堂 或作建安蔡純父

建安万卷堂

建安曾氏家塾

建安王懋甫桂堂

建安刘元起家塾

建安刘日新宅三桂堂

建安刘叔剛

⑤ “咸淳臨安志”卷八。元“西湖书院重整书目”。

⑥ “方輿胜覽”卷十一。宋本“后村居士集”。朱子“嘉禾县学藏书记”。

建安刘之間
 建安江仲达群玉堂
 建安魏仲立宅
 建安魏仲举家塾
 建安陈彦甫家塾
 建安黄善夫家塾
 建安蔡子文东塾
 建安虞平斋务本书堂
 建安虞氏家塾
 建安庆有书堂
 建溪三峰蔡梦弼傅卿家塾建溪或作建安
 建阳崇化书坊陈八郎家或作建宁府陈八郎书舖
 建宁府麻沙鎮虞叔異宅
 麻沙鎮南斋虞千里
 麻沙鎮水南刘仲吉宅
 麻沙刘仲立
 麻沙刘智明
 麻沙刘将仕宅
 麻沙刘通判宅
 建安余恭礼宅
 夏淵余氏明經堂或作建安余書卿宅
 建安余彦国勵賢堂
 余氏广勤堂
 建安余仁仲万卷堂
 余靖安勤有堂

以上三十三家书坊各刻了不少书，經、史、子、集、日用、迷信书都有。他們編刊的考試用书，更是“日輯月刊，時異而歲不同”。其中蔡夢弼、黃善夫各刊《史記》，蔡珙、刘之間、刘元起均雕“汉书”，刘仲立梓“前后汉书”，以及魏仲立本“唐书”，魏仲举本“昌黎集注”等在学术上較有价值。这些书坊中尤以余氏最为有名。余氏从北宋起，就以刊书为业，南宋时余姓书坊发达，万卷堂主人余仁仲，是国学进士，所刊“尚书精义”、“公、穀二傳”等，世称“建余氏九經本”，与兴国于氏本“皆分句讀，称为善本”。勤有堂于他处選購紙料，印記有“勤有”二字。宋理宗时，余文兴以旧有“勤有堂”之名，号“勤有居士”。余靖安勤有堂刊印“古列女傳”。元代余志安勤有堂刊行“唐律疏义”等多种。这些堂号虽改易主人，而老字号仍不变，当然他們都是一家人。建宁府余氏，历两宋，元代，以至明末，繼續營業，約达六百年之久，这是世上少見的出版商。

福州是宋代刊刻宗教书籍的中心，早在北宋政

和四年（一一一四年），就刻成“飞天法藏”，后賜名为“政和万寿道藏”。同时，福州开元禪寺募緣雕造“毘卢大藏”，称“开元寺板”。在此以前，东禪等院也开鑄大藏經板，称“崇宁万寿大藏”，或称“东禪寺板”。这两大藏經都到高宗、孝宗时始毕功或补完。在同一地方先后刊成工程浩大的两部大藏經和一部道藏經，可見当时福州人力物力富饒的一般。

泉州在孝宗时即刻书十种，其中有泉州公使庫印书局印造的“司馬光文集”。漳州有射墪书坊。邵武也有书坊。邵武东乡朱中奉宅在紹兴間曾刊行“史記集解”。

南京在南唐时已經刊书，紹兴初年地方官叶梦得，捐軍賦余緡六百万給学官，使刊行“六經”。“景定建康志”卷三十二記建康府的书板多至六十七种，每种注明板数，几乎近一万板。除一般經书外，有“小儿疮疹論方”等医书。其中“六朝实录”（即“建康实录”）与“花間集”，在地方官吏与幕僚离开时，照例可以作为贈送的礼物，已开明代“书帕本”之先声。其余如宁国府、徽州、池州、饒州、信州，为紙墨产地，雕板印书，就地取材，比較方便，鐫板亦多。江南西路各州軍所刻的，宋时称为“江西本”，其中又分“江州本”、“建昌本”等名目。

此外，长沙也設有书坊，称“长沙本”或“潭刻本”。广南东路潮州所刊的称“潮本”。以至当时号称烟瘴地方的广南西路的柳州、象州，都有刊板。甚至孤悬海外的琼州，在紹兴癸亥（一一四三年）也刊行儒医初虞世的“必用方”。⑦这比近人所說海南島在十六、七世紀开始出版书籍要早四、五百年。可以說，南宋时代的雕板印刷术，至此已几乎傳布到全国各地了。

以上是南宋各地刻书的大致情况。因为时隔七、八百年，宋板书流傳到現在的，只不过是存十一于千百，总共不过六、七百种（內有不少又是复本），又多缺头短尾，殘缺不全，或缺去序跋，或缺少刊語牌子，无从辨別其刊刻地点与鐫板年月。宋人在行文中又喜欢用古代郡邑名，或山川別名，所以有的虽然注明某处刊板，也不易考訂其为宋代某地，或今屬某地。因此，以上所举的刻书地点，自然是不够全面的；然而也可以反映出十二、三世紀雕板印刷术在我国内部发展傳布的一些真实情况了。

⑦ 宋李光《庄簡集》卷十七。“跋再刊初虞世必用方”。